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20

近代边疆危机视域下冯子材的历史地位述论^①

蒋金晖

(岭南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冯子材受清政府重用,先后出任负有“巩固疆陲”使命的广西提督、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大臣、云南提督等职,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为治理粤、桂、滇三省边疆危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饱经内忧外患之苦的上述边疆濒海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建树。被时人盛赞为“边关卧虎”、“国门砥柱”,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关键词:冯子材;治理;边疆危机;军事斗争;政治建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111-07

On Feng Zicai's Historical 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Frontier Crises

JIANG Jin-hui

(School of Law,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From 1865 to 1901, Feng Zicai was appoin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s the Governor of Guangxi Province with the commission of “fortifying and protecting the frontiers”, the Defense Minister supervising Qinzhou and Lianzhou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Governor of Yunnan Province, etc. For 36 years, Feng Zicai had carried out extremely hard and bitter military struggles, and made foresightedly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frontier c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xi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as well as for the stability,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bove provinces that had suffered from many domestic troubles and foreign invasions in their frontiers. Highly praised by the people of that time as “the crouching tiger on the frontiers” and “the doorpost of the country”, Feng Zicai was indeed an outstanding national hero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Feng Zicai; deal with; frontier crises; military struggle; political achievements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日渐深重,尤以与越南、缅甸接壤,遭遇法、英两国觊觎和染指的粤(包括今日海南)、桂、滇三省为烈。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冯子材受清政府重用先后出任负有“巩固疆陲”使命的广西提督、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大臣、云南提督等职,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为处置饱经内忧外患之苦的粤、桂、滇三省边疆危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边疆濒海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建树。

① 收稿日期:2015-03-16

作者简介:蒋金晖(1962-),男,湖南湘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 驰骋边疆战无不胜的“国门卧虎”

自太平天国起事后,广西就一直动乱不止,边疆地区尤为严重。同治七年(1868),广西巡抚苏凤文奏称:“粤西拘乱多年,全省糜烂,边境一带尤为遍地荆榛。”^{[1]26}而当时纵横广西边疆的反清武装,主要是于咸丰二年(1852)起事至十一年(1861)在太平府称“延陵王”的吴凌云,势力蔓延至与越南接壤的左右江流域。同治二年(1863)吴战死,其子吴亚终继续率余部流窜各地,形成割据独立、分裂边疆的严重局面,广西当局一时措手不及。

清政府在得知上述严峻形势之后,于同治六年(1867)急命刚从江南撤回赴任广西提督的冯子材率兵前往。冯子材先是清剿了左右江地区的反清武装,后又于同治八年(1869)奉旨入越剿灭了吴亚终及梁天锡等股。据越南史书称:嗣德二十三年(同治九年)夏六月:冯帅乃还军谅山,设坛醮祭物故诸营弁,计兵物故者十之二三。至是班师入关,冯帅统三十一营,每营二三百人,数不满万。去年三月出关,是年六月回轺^{[2]25}。援越桂军为此牺牲了两三千人。同治十年(1871)四月,冯子材再次入越追剿吴亚终余部黄崇英等股,他在奏捷时忆及此行的艰辛:“一路崇山峻岭,瘴雾迷空,水土最为恶劣,每遇深溪断涧,桥筏俱无,转运艰难,士多枵腹,饥病者十居七八。”^{[2]50}

光绪四年(1878)底,清将李扬才反叛入越,欲夺越南王位,中越政府震动。冯子材第二次奉命追剿,将李扬才活捉,清除了一个威胁中越边境安全的严重祸患。广西巡抚张树声奏报其战绩称:“为时仅及一年,克巢垒不下百处,擒斩降散之贼不下万余,死于战、死于病之员弁兵勇亦不下千数百人,成功之速,伤亡之惨,皆前届所没。”^{[3]13}

光绪九年(1883),冯子材被存心争夺广西军权的湘淮系官僚逼迫辞职。在中法战争前期,继冯主持广西边防的湘淮系官僚徐延旭、黄桂兰、赵沃、潘鼎新、苏元春等屡战屡败,损兵折将,还被法军打入关内,几近毁掉冯子材所苦心经营换来的粗安局面。危急关头,幸有清政府派冯子材及时驰援并一举创造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敌的奇迹镇南关-谅山大捷。两广当局总结其获胜原因,在历数参战诸将的功劳之后说:“然非冯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奋发,镇边安民,戡掠收溃,设险倡战,料敌情,散贼党,广援应,则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解,惶骇远遁;故诸将皆有功,而尤以该帮办为首功。”^{[4]455-456}

中法战后,清政府和两广当局发起治理与法占越南水陆毗邻的粤西海疆的新行动。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冯子材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钦廉一带防务”,肩负起拱卫整个粤西海疆的重任。

在肃清钦廉地区的匪患后,冯子材挥师渡海剿灭了“积年窝聚盗匪,或驾艇拦劫过往商旅,或剽掠沿海村镇居民,久为边海大患”^{[5]22}的九头山、亚婆湾洋匪。随后,他又奉命平定了曾在中法战争时被法国拟为“踞地为质”目标的海南岛动乱。冯子材在回顾其作战过程的艰苦时称:“官军入琼以来,各路剿办历时九阅月,固已力尽筋疲。而诸贼老巢又为亘古人迹不到之地,不惟蛮烟瘴雨,恶劣异常,且毒弩、毒箭、毒蝗、毒药,无一非害人之具。论者谓越南地面无此恶劣,甚属实情。”^{[6]41}

由于冯子材和两广当局的不懈努力,钦、廉地区和海南岛的动乱得以及时平定,以至后来法军在侵略粤西海疆时感到无机可趁,不敢再选择上述地区作为目标。

平定海南岛归来,清政府于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任命冯子材为云南提督;但冯以“前在琼州剿匪所染疾病”为由婉言拒绝,他宁愿弃官不做,也要守卫桑梓以抗击法军可能的侵略。清政府允其以云南提督的身份带薪养病:“冯子材仍着暂留广东督办钦州防务,毋用开缺。”^{[6]49}从此,冯督办钦州防务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此期间,法国侵略者一直不敢对粤西海疆贸然下手,直到冯离开之后,法军才于1898年强占了冯之兵力所未及的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缅甸、老挝三国交界。英国早在1824年就发动侵缅战争,1875年,英国马嘉理就曾从缅入滇,但被当地人打死,是为“马嘉理案”。到1885年,英国完全并吞了缅甸。1897年,英国侵入与其接壤的云南片马地区,中英发生片马交涉,清政府催命冯子材赴云南提督本任^{[7]44}。《冯子材传》记载其在云南治边安民极力维护祖国主权的逸事称:“子材曰:吾国人乙酉既误于法,甲午复辱于日,亡羊补牢今未晚也。滇民争界,焚毁蒙自洋关,英人初提交凶赔款之议,子材衔命驰往查办,于烬中发见洋关窖藏军械,据以指摘英人,英人词屈,仅参革失职都司一员,拿暴动首匪一名决之,三日而案结。及巡视腾越镇境,英人缘争矿界被仇杀,仅劾去腾越镇总兵一员,交涉便息,闻者莫不

曰:威望使然。旅滇法人尤惮之,某日巡经省垣,提督例以黄华馆为行辕,适法之路矿委员先擅入寓,滇抚丁振铎屡令迁出不应,闻子材至,夤夜迁避,不敢留省城。子材旋乘舆过督署,途遇法教士,撞道不让步,与卫队纠缠,子材立命鞭撻之,伤甚,走诉法领事,法领戒勿与冯氏较,寻且死。子材守滇数年,除股匪杨自元聚党数千,移时荡灭外,地方晏然,边人比之卧虎。”^{[8]192-193}

光绪二十六年(1900),侵缅英军悍然闯入云南,冯子材奉命前往抵御。云南巡抚丁振铎奏称:正月十四日,突有英兵数百闯入内地,经茨竹土把总左孝臣理阻。英兵诡称查界,并无他意,诂于是夜忽发号开枪,烧杀茨竹、派赖各寨,左孝臣率土练土民抵御,致被伤毙一百余命,左亦登时阵亡,英兵即占踞该处,威逼土民归顺。云南腾越镇总兵张松林、署腾越同知杨均遇闻警,派兵往援,英兵始退出界外^{[9]175}。这是法占广州湾模式的又一翻版,腾越地区岌岌可危。“适提臣冯子材查阅营伍到腾,臣即电请提督同镇厅妥为布置防务,绅民亦请留提督暂驻腾城,以资镇慑。”^{[9]175}冯子材在七月十九日奏称,他当时已作好还击英军的准备:“奴才春间往腾越查点防营,英鬼闻风日夜震恐,日则上岸,夜则下船避匿,华民在缅者欲乘乱为缅王复国,恐中华不助,因不敢遽动。若令奴才带兵往剿,在永昌、腾越一带招得数营,使为乡导,以粤勇继之,亦势如破竹。”^{[10]807}

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冯子材上奏力主坚决抵抗,并向清政府提出募兵二万,分道进取英属缅甸、法属越南,迫使英法之兵回救,则北京之急不救自解的计策:“若虑无将可用,奴才虽则年老庸暗,尚能耐劳,且久悉洋情,见惯不畏。如蒙委用,愿得自募二万人,便宜行事,分道进取缅甸、越南,为釜底抽薪之法,使英法之兵回救缅甸,则北京之急不救自解。如畏或有颠蹶,事愈难为,则奴才敢保必胜。”^{[10]806-808}冯对抗击列强侵略充满必胜信心。

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近36年的戎马倥偬中,冯子材在清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下,以满腔的爱国热忱,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素得人心”的政治优势,以弱敌强的“积极防御战术”,率领两个儿子及其“萃军”,为捍卫粤、桂、滇三省边疆浴血奋战,创造了师出必捷战无不胜的军事传奇。其深远而又重大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1)维护和巩固了三省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在粤、桂、滇三省边疆,可以这样说,哪里有冯子材,哪里就有稳定;反之,只要他一离开,情势就急转直下。如:他被迫辞去广西提督后,接替他主持广西边防抗法的徐延旭、潘鼎新就连连败退;而一当他率军赴援,马上就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冯子材镇守粤西海疆十三年,法军不敢轻启衅端,但他离开不到一年,广州湾就陷入敌手。1901年,侵缅英军攻打云南腾越,戕官占地,无所不为,但冯子材一到,英军马上就赶紧撤退。

(2)打击了列强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冯子材是“中兴名臣”中唯一一位率领装备和训练最差的军队却敢与横冲直撞的英法列强针锋相对并且取得完全胜利的清军将领。他在广西大败法军,在云南逼退英军,屡战屡胜从无败绩,不仅粉碎了英法企图从陆路入侵我国边疆的图谋,而且改写了近代中国对外战争总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而告结束的悲惨纪录。

(3)捍卫了粤西海疆乃至整个南海海疆的主权。冯子材是罕有的海权意识强烈的晚清将领,面对法国觊觎西沙群岛的野心,他不仅高度警觉而且在中法勘界之时誓死力争。他强烈的海权主张及平定钦、廉一带边境土匪并跨海肃清九头山、亚婆湾一带洋匪的行动,对当时乃至以后中法签订界约、确定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与越南的岛屿归属线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1]。尤为重要的是:海南岛在冯子材的平定和治理之后,因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加上其崖州(今三亚)与西沙各岛相距“旦暮可达”,不久即成为清政府统筹经营西沙群岛一切事物的根据地^[12]。其对西沙与南沙海洋权益的维护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2 深谋远虑励精图治的“中兴名臣”

冯子材认为捍卫和治理边疆,军事斗争只是短期的治标行为,要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还必须军政并举标本兼治。在粤、桂、滇三省当局的支持和配合下,冯子才推行了一整套立足长远卓有成效的举措。

2.1 军事斗争策略:“良莠有别”、“剿抚兼施”

在追剿广西边疆及蹿入越南的反清武装中,冯子材始终恪守“区分良莠,剿抚兼施”的政策,招抚胁

从者成千上万^{[5]36}。在进剿海南岛的动乱时,两广当局与冯子材一道及时发布了《抚黎章程十二条》,申明“官军此举,专为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秋毫不扰,毋庸畏惧。”并承诺“从前为匪黎人,投诚者免,抗拒者诛,擒斩来献者重赏。”^{[6]54}

上述军事斗争策略,不仅有效地争取了动乱地区的广大民众,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一小撮顽匪,确保剿除匪患与勘定动乱取得胜利,而且为战后迅速安定人心恢复生产乃至抗击外敌铺平了道路。

冯子材的军事斗争策略还呈现出两大鲜明特色:

(1)军纪严整存恤百姓致力于赢得政治优势。

在追剿广西边境的反清武装时:“马平知县沈用济强加钱粮,县民蓝深翠等抗纳,沈诬蓝为匪,请兵剿办,子材曰:我兵为国家打强盗,不打百姓,你打百姓,向抚台请兵可也。”^{[8]193-194}在中法战争时的龙州:“(时从前敌)败兵溃后,或抢米,或劫财,强占民房。先君(冯子才——引者注)亲督差官四路巡查,适有某军某队官,硬取铺门及棉被,正在扭争,并口称:我爵爷(指杨玉科——引者注)死得好苦,我成了无主之人,我这队官也不抢板,今借用你的,租东西算不了事,我自有管辖,你冯老头管不了。先君见其恃顽不守军法,回顾差官喝声杀掉去,刀光过处头即落地。经此一举,诸军散兵不敢恃势强行,人民妇女始敢归家。”^{[8]301}

在海南岛平乱,冯子材十分注意保护黎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曾请示张之洞:“黎民牛只财物兵勇不取,……弃勇舍命破巢,得贼牛物准要否?乞示。”张答复:“真系匪巢,又系攻克,一切财物皆准要,良民及受抚者便不准矣。”^{[13]3-4}

(2)区别对待妥善安置立足于从源头上消弭隐患。

同治七年(1868)广西边患肃清后,冯子材发布了《善后事宜》13条,其中就安置降众做出规定:“(对降众)酌赏川资,给发路票,令其自行散归。一面造具名册,咨行各原籍地方官,谕令乡绅族老等,俟降人抵家之日,或于宗祠尝产稍给资本,或通乡合族量力资助,令其小贩营生,或营工力作,乡人纵有旧嫌,不许寻衅报复。仍令该绅耆随时稽查约束,如有桀骜不驯者,送官严加惩治。倘敢窃发为匪,一经地方官拿获,或被乡绅族老捆送,即行就地正法,以杜乱萌。”^{[2]26}

在数度入越剿匪的过程中,冯子材同样注意安置降众且收效甚巨。越南史书称:秋八月,“陆岸股匪黄简、陈晚率党千余,向冯提督军门请降,谕武仲平随宜处置,立商冯帅饬回免碍。”^{[14]10-11}又称:冬十月:山、太诸匪党相率向清国营官、军门投降,凡万余人^{[14]22}。

在海南平乱之初,冯子材即颁布了《抚黎章程12条》,其中对降众的安置规定:“投诚黎首,开送户口册,捆献匪徒,缴呈枪械;投诚黎众,随大军伐木开山,前驱向导,仍按里数酌给赏犒。”^{[6]54}

对降众不仅发放回家的路票川资,还虑及他们返乡后的生计,并禁止“纵有旧嫌”的乡人对其寻衅报复;对投诚的黎首和黎众,既区别对待,又都给出路。无论是战前招抚,还是善后安置,考虑堪称妥贴周全,为降众重新融入社会,从源头上消弭不稳定因素创造了有利条件。

2.2 治边指导思想:军政并举标本兼治

同治七年(1868),冯子材根据广西边疆的社会矛盾,通过追根溯源对症下药,实施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与广西当局联名发布了《善后事宜》13条。内中包括五个方面的措施:边境宜清查也、伏莽宜搜除净尽也、各州县交界处所宜派员驻防也、营务宜加整顿以求实用也等四条整顿边防的军事措施;边疆地方正佐各官宜专责任也、土官宜慎选承袭也等两条整顿官府行政的措施;田亩宜分别清查也、义仓宜劝捐修复积谷储待也两条整顿农业的经济措施;团练宜及时改革也、各乡炮楼宜令平毁并追缴枪炮也、保甲宜认真举行也等三条整顿社会治安的措施;学校宜振兴也是整顿边疆教育的文化措施^{[2]26-34}。

在治理粤西海疆时,冯子才十分注意通过军地合作、下情上达、选用乡贤、会商办案、开放言路等方式清理历史积案,化解社会矛盾。中法战争后,冯子材返粤,曾向张之洞报告钦廉边境的治理计划称:(1)先清案牍,弄清究竟还有多少积案未清;(2)饬各州县先拟各犯罪名,以作将来办案根据;(3)饬各属起团,“大局准用练丁二十名,小局十名,”专为缉解匪徒之用,以弥补兵力的不足;(4)咨行邻境截缉;(5)遴选公正绅士帮助办案;(6)机密公事必须当面筹商;(7)出示招告,让原来沉冤莫辨的苦主敢于出头告发坏人^{[5]11-15}。这些清除社会积弊、促进司法公正的综合治理措施,对争取钦廉百姓人心,维护社

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十三年(1887),海南平乱取得彻底胜利,为将《抚黎章程十二条》付诸实施,冯子材在两广当局的支持下颁布了《善后事宜》以“除弊化俗”。计有:移民垦田、招商伐木、助商开矿、设官控制、力除苛累、广兴义学、开十字大路等。此外,冯子材还通过开设集市贸易,发展黎区经济:亲自创建了五指山货栈,并在岭门等各峒口设场进行集市贸易,加强黎汉之间的密切交往;实行以黎带汉开发黎区,把一部分汉民带到黎峒,教示黎民放弃“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改用以犁耙田种稻,不仅三年不收赋税,而且扶助救济生产工具如耕牛等;还在海口、兴隆、陵水、南丰、崖州等五地设立无线电报局,发展海南的电讯事业等^[15]。

《抚黎章程12条》及其《善后事宜》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是一个全面而又系统的社会综合治理方案,它不仅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而且开始向“国家主义”转变^[16]。它有三个鲜明特色:

第一,将解决民族冲突作为主要方略。它从“以期黎汉永远相安”的目的出发,以“总令于黎人有益”为原则,以尊重黎族人民的权利为前提,以帮扶黎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以加强黎汉经济文化联系为纽带,采取多种举措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第二,将解决官民对立作为治理重点。它一方面对“新经开通处所”“形势冲要”之处设官控制,另一方面又对“刁黠贪横”“苛虐黎人”的世袭总管“一律革除”;一方面对“抑勒欺蒙”“黎村粮赋”的“蠢胥地棍”等“严行惩办”,另一方面又对粮赋“量加核减”并“严飭各属”“力除苛累”,以期达到消解官民对立、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负担,提高其生产与生活水平的目的。

第三,将国家认同作为发展大计。它通过设官控制与因俗而治,实现了黎族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有效整合,加快了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通过兴办文化教育与交通电讯等近代化事业,倡导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不断强化国家认同,为海南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冯子材高瞻远瞩的治边主张,兴利除弊的军政举措,善待百姓的为官之道,严谨务实的办事风格,为所在边疆带来了三大喜人变化:一是三省边疆很快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二是三省边疆从此不断走向稳定,即便发生了中法战争时法军打入关内及占领广州湾、英军入侵腾越等严重的边疆危机,也没有发生边民乘机进行反清骚乱或配合外敌反击清军的情形,从而为抵御外侮捍卫主权创造了先决条件;三是冯子材在三省民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参加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到江南助防,以及后来会办广西军务的过程中,只要冯子材一声令下即可在很短的时间里组成10营(5000人)到20营(10000人)的“萃军”参战。在中法勘界期间,冯子材因不满清政府将九头山、亚婆湾让给法国侵略者,曾准备武力抗争,称:“此两处……经材以兵力取之,岂可让与法人?请公等竭力争回。倘彼不依,材现将匪办清,即撤兵渡海与之决战矣。今上不发兵,材必起东西两省民团三十万,直捣西贡,决不干休。”^{[17]99}

3 公忠体国刚直不阿的反腐斗士

俗语云:“治国先治吏。”在处置边疆危机的过程中,冯子材发现治边的成败同样系于吏治:边吏的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会逼反边民,加剧当地的社会动乱;边将的克扣军饷拉帮结派,会导致将士反目军心离散,战斗力大为削弱,从而撼动边疆稳定的大局,最终使治边成果付诸东流。因此,肩负治边重任的冯子材,面对贪腐将官,常常怒不可遏:不是拍案而起与之斗争,就是义正词严上书弹劾,而不管他们是何派系,有何后台,即使因此而丢职罢官他都在所不惜。

刘长佑是湘军头子,咸丰年间因追剿太平军而率军入桂,因功于咸丰十年(1860)擢广西巡抚并兼提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趁此契机,他培植了张凯嵩、徐延旭、赵沃等一大批依附于他的文武官僚,并将所带湘军楚营留防广西,以致桂地成为湘系的天下。刘于同治元年晋升两广总督^{[18]12123-12126},其广西提督一职由冯子材接任。

但就在与入桂湘军将领何元凤一起进发边疆期间,冯子材发现了何的许多贪腐行为,随即于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十九日上奏《特参游击贪鄙片》。清政府于同治七年(1868)正月二十七日下旨:“冯子

材奏参游击何元凤贪鄙违误各款,据称该员带兵驻扎毛难,苗匪冲围水扛地方,调令驰援,故意阻挠;领到饷银六千余两,仅支放三千余两;逼捐瑶民钱米激变,损伤营勇,捏报胜仗;纵令幕友得受客民赃银;经该提督派员接统其众,挟制抗违;荔波苗匪闯入思恩县界,该员私离防所,营勇无员统率,致令该匪长驱,攻扑庆郡。其随剿那檀、山泽等处,私收逆首黄三妇女,并将枪炮等件入己家内,私筑炮楼墙垛等语。以上各款均属大干法纪,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戎行而警效尤!”^{[1]17-18} 据此可知,何元凤扣饷怠军,逼捐激变边民等,已严重危害边疆治理,所以冯子材要参劾他。

随着调查的深入,冯子材在同治七年(1868)八月二十一日上奏,指出广西边疆长期动乱的原因是由于前广西巡抚张凯嵩“纵寇殃民,居心壅蔽”所致^{[19]24}。清政府于十月初三日下旨:“张凯嵩规避云贵,朝廷洞悉其情,是以将其革职。至在广西巡抚任内,贻误军事,婪索属员,如果属实,大干法纪!”命苏凤文查奏。但苏复奏称:“遵查张凯嵩服官西粤,历办军务,并无贻误。擢任巡抚后,整躬率属,并无婪索各情。”^{[19]24} 否定了冯子材的指控。

在同治十年(1871)第二次援越剿匪过程中,冯子材奏参太平府知府徐延旭“逐降为贼,纵勇通贼,冒饷厘厘,包贩人畜,捏功滥保”等种种劣迹^{[19]56}。用铁的事实揭露徐破坏治桂13条。奏后,清政府将冯子材的弹章批转调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查明复奏。但刘草草应付,不到十日就复奏称:“徐延旭历任要地,防剿有功,遵旨复查被参各款,均无实据。”不知是出于维护新巡抚刘长佑的威信,还是要保全徐延旭这位“能员”,清政府对于刘的这种睁眼说瞎话的袒护不仅没有驳回,反而给予支持。九月二十八日有旨:“徐延旭既查无营私舞弊等情,著无庸议。”^{[19]56}

冯子材参徐一事,不仅得罪了刘长佑,而且与徐延旭结怨,并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官场进退。后来,淮系头子李鸿章、张树声为了排挤冯子材以夺取广西军权,就与清流派头子张佩纶合谋,以推荐徐主持广西军政大权的方式逼冯去职,其治理广西边疆的事功后来险些毁于徐延旭等人之手。

光绪五年(1879),冯子才在追剿入越叛将李扬才的过程中得知,李实际上是被湘系官员、广西边军右路统领、候补道赵沃激反的。赵沃在广西边军中挑拨是非,拉帮结派,清除长期随冯治边的有功将士,严重瓦解边防将士的军心。于是冯子材与广西巡抚杨重雅联衔奏参赵谎报战功。清政府纳奏,将其革职,毋庸留营^{[19]115}。但出自湘系的两广总督刘坤一和出自淮系的广西巡抚张树声却对赵百般包庇,致使清政府驳回了冯的意见。虽然赵被革职,但仍让其“留营效力”^{[19]123},为赵后来开复留出生路。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冯子材率萃军赴援在法军打击下屡战屡败的广西边关,但却被出自淮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诬奏:当激战时,“冯子材、王德榜二十八营飞催不至,掣肘万分。”^{[20]233} 清政府览奏后,于十三日下旨责问:“冯子材、王德榜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已极!著张之洞、潘鼎新传旨严催援剿,倘再玩延,即照军法从事。”^{[19]263} 口气的严厉,是冯子材从未领受过的。幸好冯子材据实向两广当局申辩,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战败的主因是由于潘鼎新的瞎指挥所致,与冯等无关。清政府这才恢复了对冯子材的信任。后来,冯子材以指挥取得镇南关—凉山大捷的骇世战绩,有力地回击了潘的诬蔑。

在平定海南岛动乱后,为激励军心,冯子材循例向清政府保举有功的部下。但经办此事的吏部书办按惯例致信立功将士,要他们出钱作经办该保案的费用。冯子材闻知此事,授意将士予以抵制。该书办等即以“颠倒保案”进行报复(即将该升的将士予以降职)。冯闻之大怒,遂上奏参劾吏部经办书吏。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有旨称:“前据冯子材奏:特参吏部书吏任意索贿,颠倒保案,请将议驳之员仍照原保给奖,暨声明伊子前次保案应否照准各折片。当谕令吏部将书吏沈锡璋即沈梅卿,并冒充沈梅卿之樊子清一名,工人张升一名拿获,着交刑部严讯确供,据实复奏。”^{[21]210}

在云南任职期间,冯子材又将云贵总督崧蕃告上清廷。据胡思敬所撰《国闻备乘·藩司受制督抚》记称:“近唯见……冯子才以云南提督参总督崧蕃,子才宿将,……终亦不能取胜。”^{[13]261} 但最终结果如何却不得而知。

在捍卫和治理边疆的36年中,冯子材与危害边疆治理的贪腐官员及其后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涉及张凯嵩、苏凤文、刘长佑、涂宗赢、张树声、潘鼎新、参与推荐徐延旭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后期参与攘夺其镇南关大捷首功的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云南巡抚崧蕃等9个巡抚(这些人中如张凯嵩、刘长佑、涂宗赢、张树声、张之洞、崧蕃等后来都升任总督,加上李鸿章共7位总督),以恭亲王为首的5位军机大臣

(原任军机章京的钱应溥后来也升任军机大臣),还有知名谏官张佩纶等。即使被迫辞去广西提督一职也不后悔,重新复出后仍坚持与贪腐官员作坚决的斗争,在晚清末世昏暗的政坛上刮起了一缕清风,从而成就了他戎马人生中的另一大亮点。

4 结语

在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在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豆剖瓜分的关键时刻,冯子材无疑是一位不辱使命战功卓著的军事家、目光远大富有建树的政治家。作为军事家,他凭借其独步于时代的战略战术^[22],指挥取得大败法军的镇南关—谅山大捷,一改近代以来对外战争失败后赔款割地的屈辱历史;他以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出生入死的牺牲精神,率领自己的两个儿子亲临前敌,将粤、桂、滇三省内外匪患悉数清剿,不仅挫败了英法列强乱中取利浑水摸鱼的险恶图谋,而且实现了上述地区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稳定。作为政治家,他关注中越勘界谈判,他以强烈的海权意识,超前的战略眼光,为维护祖国权益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23];他以知微见著的政治敏感,深谋远虑的军政举措与正本清源的综合治理,不仅粉碎了法国侵略者企图从海路入侵中国的阴谋,“使数千年来衣冠不到之地”的海南岛,“一旦可隶版图”^{[6]17}。而且为粤西乃至整个南海海疆的稳定和维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身为武官而能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计利害地与破坏边疆安定的贪官污吏作坚决的斗争,不仅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唯一。其刚直不阿的人品,公忠体国的情怀和宁折不弯的勇气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云卿,都启模.冯子材·军牍集要(第5卷)[Z].1895.
- [2] 张云卿,都启模.冯子材·军牍集要(第6卷)[Z].1895.
- [3] 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第5卷)[M].南宁:广西社会科学院图书馆,1899.
- [4]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6册)[C].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 [5] 张云卿,都启模.冯子材·军牍集要(第11卷)[Z].1895.
- [6] 张云卿,都启模.冯子材·军牍集要(第12卷)[Z].1895.
- [7] 广西通志馆,图书馆.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第6册)[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 [8] 广西钦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钦州文史(第五辑)[Z].1998.
- [9] 郭强.清东华录全编(第24册)[M].上海:学苑出版社,2000.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1] 郭渊.从近代国际法看晚清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求索,2007(2):201-205.
- [12] 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130-138.
- [13] 王树楠.张文襄公全集·电牍(第8卷)[M].北京:中国书店,1990.
- [14]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第41卷)[Z].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出版.
- [15]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黎族史料专辑[Z].1993.
- [16] 周平.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135-141.
- [17] 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1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18] 赵尔巽.清史稿(第44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9] 广西通志馆,图书馆.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第5册)[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 [20]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4册)[C].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 [21] 郭强.清东华录全编(第22册)[C].上海:学苑出版社,2000.
- [22] 蒋金晖.冯子材刘永福历史地位合论[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2):157-160.
- [23] 蒋金晖.晚清政府处置粤西海疆危机及对南海维权的历史意义[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6-21.

(责任校对 龙四清)